

“游”是一个颇具庄学特色的术语,在此句中它用以说明生命无所牵系而优游于“德之和”的境地。

如果说“和”强调的是解悟之“德”的和谐完满状态,那么“游”则更倾向于表述“德”的逍遥无碍的情境,唯其无碍,始得和满。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自我“悬解”的“德”概括为“游和之德”,意味着超越了所有的生命负累、保德而体道的心灵境地。较之第一节讨论的作为自然本性的“天真之德”,这种意义上的“德”更侧重于指经由自我之解悟而充分实现的“德”。当然了,经由自我解悟而保全的“游和之德”正是人人生而有之的自然真实之本性。

通过以上对庄子之“德”的讨论,我们看到了个人生命之“德”在庄学中的多重意域。这里说的多重性,并不意味着“德”这一概念兼含了自然本性(天真之德)和心灵境界(游和之德)的双层意义,而且它还可以承载生命价值何以会流失以及个人自我又如何解悟等方面的内容。庄子深深关切于天下众生,感叹于德性败坏的社会现实,由此提出“去德之累”的“悬解”方案,期待着每一个人都可以保全生命本有的天真之“德”。由是而观之,庄子思想中“德”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道”,后者指示着生命价值的目标,但如何排除生命的各种负累,从而完满地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自我的体悟与解脱,这种解悟便是“德”。

在探讨“德”观念的先秦诸子中,庄子的这种思路显得比较独特。老子关于“德”的诉求主要是针对治国圣

人,但庄子将视域投放到天下间的所有人,关注众生之“德”如何才能够保持。而在另一方面,庄子的“德”观念也表现出和老子一脉相承的地方。不同于孔、孟强调人之德性从小到大的培养过程,老、庄之“德”更关注如何减免各种累德的情由。如果说孔、孟对于“德”的诉求主要是一种“加法式”的人文修养,告诉我们要做什么;那么老、庄关于“德”的期待便可谓是一种“减法式”的自然涵持,告诉我们要不要做什么。

总言之,基于庄子之“德”的“悬解”之义,我们便不宜断言庄子独求个人自适而没有社会关怀,他只是选择了一种比较独特的救弊方式。如果说庄子没有社会责任感,那他为什么留下这些文字?难道真如司马迁所说的,只是为了“适己”吗(司马迁评价庄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4页)?殊值寻味的是,庄子明知“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也承认老子说过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147页;又见于《庄子·天道》),但他偏偏言了这许多,此举与佛家的“开权显实”是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

收稿日期 2012—12—05

作者叶树勋,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084。

【责任编辑 叶子玉】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天主教会

李晓晨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也给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在日军的破坏和打击下,河北教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面对日本的侵略,罗马教廷与教会一些高级领导人标榜中立,实则限制了天主教徒的抗日爱国行动。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一些天主教爱国人士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 天主教会的遭遇

1. 正定惨案

正定惨案是1937年日军对河北天主教会制造的一

起严重惨案。正定教区主教文致和与其他7位外籍传教士及1位外籍俗人共9人被日军屠杀,震惊整个天主教会。

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0月9日晨攻占正定县城,在城内大肆屠杀。尽管日本军官许诺对教堂予以保护,但仍有日军士兵到教堂抢掠财物。9日下午,约40名日军士兵来到天主堂大门口,有数位日军士兵赶往若瑟会女修院。文致和立刻派神父夏露贤和贝德良与日军交涉,二人旋被锁押于门房。日军接着闯入教堂,包围了文致和主教及20余位神父、修士,先后绑住了修士艾德德、主教文致和、毕安当先生、司铎柴慎诚、司铎卫之纲、苦修会士霍尼玛、修士泊林芝。日军

把主教、神父与门房锁押的2位神父共9人押走。当晚,文致和等人即在离主教府300公尺的木塔上被全体烧死(笠原:《正定天主堂天主教及其司铎殉难经过》,天津《益世报》,1946年5月19日,第3版)。

正定惨案中,日军为什么只捕杀外籍传教士?难道他们不怕开罪于西方国家吗?负责调查正定事件的日本军方代表横山彦对此疑问的解释是:负责进攻正定县城的是日军将领香月的部队,其手下一批士兵是刚从狱中释放的江洋大盗。这些土匪野蛮成性,香月管辖不了(笠原:《正定天主堂天主教及其司铎殉难经过》,天津《益世报》,1946年5月19日,第3版)。《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的作者则认为,正定惨案直接罪魁不是日本人,而是日军所用的“满洲人”或朝鲜人。上述说法,实则是为日本推脱责任。正定惨案中日军之所以抓捕外籍传教士,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知道天主堂是外籍传教士管辖,他们以抓走外籍传教士相威胁,以达到寻找良家妇女的目的。据一些资料记载,当主教、神父被押走时,日军士兵曾勒令用300名青年妇女来赎,不然,便没有命。文致和大声应道:我是主教,就是死也决不能答应你们(笠原:《正定天主堂天主教及其司铎殉难经过》,天津《益世报》,1946年5月13日,第3版)。日军恼羞成怒,便对主教、神父下了毒手。

正定惨案因传教士来源国涉及了五个欧洲国家,引起日本军方重视,为了平息国际愤怒,他们不得不派代表前来调查,并口头道歉。此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再不敢大批屠杀在华外籍人士。一些外籍人士则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建立起难民区,庇护和救助了大批中国难民。

2. 河间惨案和云台山事件

河间惨案和云台山事件均发生于献县教区。日军杀死中国籍神父、修士、修生、贞女等多人。

河间惨案发生于河间县城。1939年1月日军占领河间县城后,企图占用河间教堂内的一些楼房。7月中旬,日军闯入河间教堂,将留在堂内的神父3人、修道生9人、修士2人、先生4人、工友6人共24人以“暗通八路”的罪名逮捕,又逮捕1名教徒。7月25日,日军折磨死薛清修神父。7月31日,70多岁的李思永神父因病危获准出狱,于当晚死去,陪他回去的李永凯侥幸保全性命。9月22日,日军将其余22人于河间县城西关活埋(献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献县宗教志》打印稿,献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藏,第198页)。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河间惨案。

云台山事件发生于献县云台山。云台山位于献县城东10余里,是献县教区天主教传教士的墓地。由于其地势较高,是修炮楼理想之地,为日军觊觎已久。1941年9月8日,八路军游击队暗藏此地,打死几个伪军。日军借机扩大事态,先封闭云台山,又封闭教堂,抓去学生40多名。9月14日,日军又把张庄总堂的全部中国人共60余名集中到云台山上监禁。10月3日,主教赵振生和神父田凤庭、徐志远、何道隆又被日军押到

县城分别囚禁。期间,日军杀害了何松月神父和李万仓先生。11月22日,天主堂140余名在押人员被释放,仍有17人被关押。1942年1月24日,日军把17人员押往淮镇据点杀死(陈义:《献县教区简史》,天主教沧州(献县)教区2000年版,第98页)。

河间惨案和云台山事件中,被捕杀的主教、神父、修士等全是中国人,说明日本此时仍对西方各国有所惧惮。日军之所以大肆屠杀教会中国人员,与罗马教廷对日本侵略所持的中立政策密切相关。宗座代表蔡宁对于日军的暴行不能采取有力的反击措施,只能于事后对受难教士加以抚慰。1941年11月27日,他致函赵振声,对赵振声主教被释放出狱恢复自由表示慰问,并慰问献县全体受难的教士和教徒(《1941年11月27日罗马教廷驻华宗座代表蔡宁总主教致函献县赵主教》(拉丁文),河北省博物馆藏)。教廷的软弱、忍耐态度,无疑鼓励了日军对中国教会人员的迫害,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3. 集中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始对在华的英、美、比、荷、加拿大等与之宣战国家的西方人士逮捕拘押。1941年年底,日军把热河教区52名外籍传教士尽数拘于四平街(王守礼著,傅明渊译:《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47年版,第133~134页)。1943年3月21日,察哈尔、绥远、集宁、大同各教区的外籍传教士163人、修女32人,被日军押往山东潍县集中营(同上书,第146~147页)。永平教区主教神父30多人于1943年春被拘禁(陆春林、新宇:《薛家营村的天主教》,《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昌黎县文史资料研究会1989年版,第149页)。在献县教区,宝血会外籍修女被日军囚禁在隐修院内。1944年8月,被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的外籍传教士多数迁往北平各修会会院中(Octave Ferreux著,吴宗文译:《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台北华明书局1977年版,第650页)。直到抗战结束,这些外籍传教士才得以回到各自教区。日本对外籍传教士的拘禁,极大地破坏了河北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在永平、西湾子等教区,主教同时被拘禁,教务萎缩,教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4. 日军对教会产业的破坏与霸占

日军侵占河北地区后,除屠杀教士、教徒外,还对教会的教堂、房产进行霸占与毁坏。保定教区损失较为严重。1941年,日军烧毁了著名的东间教堂,东间“朝圣地”从此消失。此外,保定教区还有20处分堂、支堂房屋和教堂被日军毁坏(保定市天主教史料编辑委员会:《保定天主教历史沿革》打印稿,1963年印行,第12~48页)。在献县教区,日军强租教堂大片土地、房屋,“剥夺了教会超过1/3的土地和场所”(《1942年4月20日献县天主教会代表神父给日方代表木村(Honsienr ki mura)的信函》(法文),河北省博物馆藏)。永年、曲周、广平等县的教会,无一幸免。由于宗教活动场所大部被日军占领毁坏,教徒不敢到教堂聚会,有的只是在自己家里念经,还有相当一部分不

再念经。原来在农村各堂口的神父为避日军迫害,有的回到总堂,有的逃到北平等地。如永年代牧区老神父王守谦、王寒松等人逃亡北平,年轻的神父张实甫、牛洪智、朱化育、郑立仁等南渡黄河流亡逃命(肖守身:《天主教永年教区史话》,《邯郸文史资料》第5辑,邯郸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1988年版,第139页)。

二 教会人士与抗战

1. 教会高层的立场

对于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天主教会态度暧昧。由于时间久远及文献缺乏,在罗马教廷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以顾裕禄、顾卫民等为首的一批国内学者多认为罗马教廷承认了伪“满洲国”,主要证据是罗马教廷任命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为驻伪“满洲国”宗座代表。此后,东北各教区另编印《“满洲国”天主教教务年鉴》,而上海教区编印的《中华全国教务统计》从此也不包括东北各区(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页)。针对上述观点,一些学者提出质疑。台湾学者陈方中等不赞同顾卫民等人的观点,认为教廷从未发表外交文书承认“满洲国”,也未派遣任何正式的使节驻长春,甚至没有派正式的宗座代表,只是一个当地的主教,被赋予与当地政府交涉的权力而已(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6~147页)。刘国鹏查阅了大量《教廷年鉴》,没有找到教廷派驻伪“满洲国”的人员记录,从而“证实了梵蒂冈方面和伪“满洲国”之间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笔者以为,不管罗马教廷是否与伪“满洲国”正式建交,其对伪“满洲国”的模糊态度自然为中国人诟病。

蔡宁作为宗座驻华代表,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持中立态度。1939年3月14日,他发表一封致全国主教的信,“请各位可敬的主教郑重告诫属下司铎,当以明智和忍耐,埋头于神圣职务,不偏右,不偏左,即表面上行动也当避免”(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506~507页)。蔡宁这种不左不右、保守超然态度的立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民政府向罗马教廷提出抗议,国内舆论也纷纷谴责蔡宁。尽管陈方中等学者为蔡宁辩护,认为中立政策是教廷对中国采取的一贯立场(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第159~160页),但这种中立立场毕竟与中国的抗日正义事业的目标相左。因为教会是中国人的教会,教会中的司铎与教徒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有自己的民族感情。国将不国,教会焉存?这种感情,是外籍传教士无法理解的。

2. 地方教会的态度

在教廷及宗座驻华代表蔡宁中立政策的影响下,部分教会人士在日军侵略面前逆来顺受,被迫接受日伪的统治。大名天主教学校受挟于日伪教育的编制,将男女

公学高初等改为益大小学,法文学校改为四维中学,课程按日伪教育部门所发课本开设(柴继昌:《大名天主教小史》,《大名文史资料》第2辑,大名文史资料研究会1990年版,第176页)。一些神父则向日伪机关领了良民证,有的“头戴德国盔,自行车上挂着小白旗,试探着串乡传教”(肖守身:《天主教永年教区史话》,《邯郸文史资料》第5辑,第139页)。更有个别人甚至参与到日伪政权中,成为中国人所不齿的汉奸。如传教赞皇县20余年的范涌泽,被日军委任为县维持会会长(《冀南各县治安维持会联合会工作报告书》,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654-1-127)。保定教区主教周济世也与伪河北省主席吴赞周结为密友,还与日本特务机关长铃木拉上关系(王英:《天主教保定教区简史》,《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7页)。在他们的维持下,一些教士、教徒甘当顺民、亡国奴。

3. 天主教徒的爱国行动

在日本侵略面前,一些天主教爱国人士冲破了教会高层的限制,积极参加到抗日战争中。雷鸣远即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在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中,雷鸣远率领几百人的救护队,于喜峰口和玫瑰营子等处长期进行战地服务。七七事变后,雷鸣远成立公教救护队,先后转战易县、保定、石家庄等地。1938年春,雷鸣远随军至晋东。9月,任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主任。1940年1月,成立晋阳区政治工作队,代行服务团工作。长期转战辛劳,使雷鸣远积劳成疾,6月24日逝世于歌乐山(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0~321页),7月18日,国民政府对其颁发褒扬令。综观雷鸣远的抗战历程,其对抗战贡献值得肯定,同时也应赞扬其领导下的救护队员。他们多为河北地区修士和教徒,在抗战前线与转战途中,不畏牺牲,救护伤员,充分表现了天主教徒的爱国精神,为抗战胜利做出积极贡献。

除雷鸣远外,河间总堂神父徐志远积极支持河间县抗日政府工作,为他们保管钱和账目,帮八路军买枪,并为抗日政府传递情报等(献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献县宗教志》(打印稿),第197页)。永平赵各庄教堂的许士魁神父也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抗日英雄节振国和他们的同志们(李耘:《东矿区天主教史拾遗》,《唐山市东矿区文史资料》第2辑,唐山市东矿区文史资料研究会1988年版,第120页)。景县黄古庄本堂神父赖洪锡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受到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好评(范文兴、耿永顺:《景县(衡水)教区史资料汇编1939—2002》,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在传教士帮助抗战的同时,一些教徒也直接参加抗战,吴飞在《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一书中,曾列举过这方面的例子。在他采访的武垣县段庄村(化名)中,教徒段廷杰在抗战爆发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武庄当抗日学校的校长;教徒赵品贞先在本县参加义勇军,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教徒

段保甲还是三五九旅的老排长(吴飞:《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香港道风书社2001年版,第270~272页)。仅段庄一村即有多名教徒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其他村庄这样的事例也应不少。据1941年太行区六地委对邢西党内教徒调查统计,邢西党内计有天主教徒15人,耶稣教徒9人,他们大多担任一定职务,如农会主席、村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民兵指导员及公安干事等(《邢西党内教民调查登记表》,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90-1-56)。这些直接参军参战的天主教徒,不怕牺牲,英勇作战,为抗日战争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 结 语

河北天主教会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是中华民族灾难的一个缩影。面对日军的侵略与屠杀政策,天主教会内部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立场:一是中立立场。以罗马教廷和蔡宁为首,大部分外籍传教士持此种观点。二是抵抗立场。以雷鸣远等一批爱国传教士和教徒为主。三是“合作”立场。以周济世、范涌泽等一批与日伪政权合作的汉奸为代表。就这三种立场而言,绝大部分教士和教徒认同第一种观点。尽管国人对这一立场予以谴责和批评,但在日军屠杀政策威胁下,多数教徒为保全性命,不得不违心地做“顺民”、“良民”。有材料记载,日军

“扫荡”时,一些教徒在门上写“耶稣之宅”,避免日军侵犯(《邢西党内教民调查登记表》,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90-1-56)。他们的这种心态,与当时中国其他普通民众的心态基本一致,在面对死亡威胁时,想法设法保全生命是他们的首要选择,至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则是他们这些普通小民不能理解或不甚关心的问题。当然,抛弃人格和尊严去做汉奸,是一些有道德良知的教士和教徒所不齿的。周济世和范涌泽等人在教会中只占很小部分。而那些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传教士和教徒则代表了教会的主流,尽管他们与做“顺民”的教徒比人数要少,但他们的英勇战斗精神却影响和鼓舞着广大教士和教徒。在他们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教徒投入到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天主教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以河北地区为例”(09YJC77001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2—10—25

作者李晓晨,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24。

【责任编辑 公羽】